

· 理论与方法 ·

中共思想史的本相、镜像与实证研究规范^{*}

吴起民

〔摘要〕中共思想史研究业已取得重要进展，亦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点，需要继续构建更加符合研究对象属性和历史发生场景的实证研究规范。通过识别研究对象的全部属性，可以呈现中共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及其运作逻辑，揭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进路。这不仅要求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推动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减免虚造历史现场的“镜像”研究；而且要求加强研究过程的历史学规范，在学术史、议题设置导向、史料批判等环节形成一体化的实证研究操作规程。应当指出，构建历史实证研究规范是提升中共思想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中介环节，而非终点。

〔关键词〕中共思想史；主体性；真实性；实证；宏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K01；K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1-0135-18

The Essence, Mirror Imag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tandard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PC Ideology

Wu Qimin

Abstract: Import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PC ideolog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construct empirical research norm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attributes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s. By identify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 can present the situation behind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ctivities, revealing an academ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PC thought. This not only requires promoting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from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ut also reducing and avoiding "mirror image" research based on falsified historical situations. Moreover,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historical norms must be strengthened to form an integrate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links academic history, topic-setting orient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historical research is an intermediate link, but not the endpoint, in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PC ideology.

作为一种历史认识活动，思想史研究对于解读历史事实、探究历史规律具有独特优势，能够为公众提供具有整体性历史视野的知识形态。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具有历史穿透力与思想深刻性的思想史作品能够影响公众意识，甚至推动时代变革。如今，人们更加渴求从整体上深度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巨变，对中共思想史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就其自身而言，中共思想史研究亦面临着适应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中共思想史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存在忽略历史研究规范等缺点；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在史料挖掘、史实建构等方面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但也需要加强培育历史思辨、宏观解析和理论建构能力。在当前阶段，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实践旨在呼唤一种具有严密论据、严整逻辑、宏阔视野与公共关怀的中共党史知识，要求中共思想史研究在保持历史思辨与逻辑分析特点的基础上加强历史研究规范。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中共党史观与新时代中共党史学创新发展研究”（21CDJ0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结合学界已有之研究经验，立足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向，针对中共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忽略史料批判、虚造史实场景、照搬文件语言、缺乏研究实践规范等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构建实证研究规范。具体而言，中共思想史研究应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准确反映研究对象的结构特点，在本体论层面揭示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整体是如何思想和行为的，其运作逻辑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认识论上分析为何一些思想史研究容易脱离历史场景并陷入失真的“镜像”之中，产生“移今作古、亦真亦假”的认知偏差。由此，中共思想史研究应当根据研究对象的结构特点来构建实证研究规范，在议题设置、史料批判、逻辑分析、理论方法、历史书写等方面逐步降低主观随意性，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原则，探索形成科学合理的研究理念与系统规范的操作规程。

一、中共思想史的发生：主体性、运作逻辑与离散现象

在中共思想史研究所面对的诸多困扰和诘难中，“谁在思想”是一个指涉实践主体及其思想行为场景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实践主体，中共及其思想行为活动是复杂多样的。为了便于开展研究，一些研究者对其进行了简化处理，把实践主体限定为中共中央或领袖人物，把思想行为活动限定为指导思想发展史研究，以事件研究、人物研究、文献研究、理论研究等形式展开思想史考察与书写。这一策略在研究初创阶段是必要的，对于建立基础知识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深化中共思想史研究则需要直面“谁在思想”这一问题。回到历史实际，中共作为思想行为活动的主体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包含个体与集体、动态与静态、结构制度与人际交互等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统一体，具有特定的思想行为场景。在中共追求成为一个实践主体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一些被视为偏离或弱化主体性的“离散现象”。总之，从结构上把握中共思想史的主体性及其运作场景，能够从根本上打开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视野。

（一）中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主体性是指依托组织运作与价值濡化而不断实现自我认同及其目标的能力。恽代英曾言：“党的两种要素——主义与纪律”，“主义的解释，必需〔须〕是绝对统一一致的”，“这样，主义才能统一群众的耳目，发生大的力量。一定要有表现主义精神的政治纲领，与如何实现主义的政策。不然，则主义成为空谈，无法得人相信而实现出来的。一定要有严整的纪律，能部勒数万或数十万党员，在党的命令之下一致活动”^①。概括来说，中共的主体性在“躯体骨架”上体现为组织网络与制度体系，由此规范着党员个体与党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互关系；在“神经系统”上体现为思想理论及其灌输，推动思想理论转化为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在“血脉”上体现为党内交通体系，由此承载着信息、人员、物资等要素的流动。应当指出，在一定历史时期或各个组织层级之间，主体性是动态变化的，处于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运动进程之中。

在常识意义上，中共是依托“组织”进行思想行为活动的。中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组织建构和制度建制，从基层到中央、从个体到集体，层层收束推进，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差异性因素中塑造出“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一致性，产生集体意识、集体意志与集体行动。其中，还应注意组织的伸展性和纪律性。组织的伸展性既指组织设置的弹性化，比如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的互相转化；还意味着组织规模的扩展性，是一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化追求。组织纪律与制度体系是一整套具有强制性或导向性的行为规范，对于党员与组织、地方与中央、内部与外部等关系具有约束性。事实上，以往一些中共思想史研究是把用来表述一致性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呈现的是中共中央或者领袖人物的思想。各组织层级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塑造一致性的过程同样应该纳入研究范围。进而言之，应当从组织状况上把握差异性的一致性之间的动态图景，具体分析

^① 《恽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6、197页。

每一个研究问题所涉及的组织活动情况，避免“大而化之、一概而论”的取向。

作为“躯体骨架”的组织制度与作为“神经系统”的理论武装是互为依靠的，“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中共面临着一个持续性的基本问题，即如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全党的集体意识。这是因为，党员个体的思想意识具有自发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别。集体意识的建构，既包括自上而下、由外入内的思想理论教育，也包括“党内生活”与“党员修养”等方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解读经典著作和研判客观实际上保持协同。在实践活动中，中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历史、分析环境与研判未来，为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提供真理依据，而“路线”则代表着对经典著作的权威阐释，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从总体上改变或者约束全党对经典著作和客观实际的理论诠释。在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是一个伴随着剧烈的组织变动和权威重塑的根本问题，成为塑造集体意识的关键环节。由此，真理解释和组织建构实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中共主体性的“塑造—重塑”机制。

对于中共的主体性而言，党内交通体系是物资、信息与人员的流通网络，是连通“躯体骨架”与“神经系统”的“血脉”。中共历来重视党内思想、语言与价值选择的一致性，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要求“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②。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断要求建立完善党内交通，如“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③。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党内交通对于理解党员与组织、地方与中央、外部与内部的交互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承载着中共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譬如，文件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承载着真理解释与组织运作的信息流，其起草修改、讨论通过与传达范围关乎组织层级之间的互动程度，管控着各层级人员的信息差。由此，党内交通状况是把握中共主体性的切入点，应当成为史料（文件）批判与场景搭建的基本要素。

虽然中共致力于构建主体性，但在一定历史时期或各个组织层级之间，主体性是动态变化、分布不均的。从整个中共党史来看，由于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与历史任务的变迁，中共的主体性在组织规模、技术手段、制度规定、精神气质等方面发生显著的阶段性变化，而其中亦贯穿着一些具有连续性的因素，比如思想方法、价值立场、组织方式、最高纲领等等。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依托真理解释与组织建构的相互作用，中共的主体性从不均衡状态进入相对均衡状态，促使关于经典著作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上升为路线纲领政策，形成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从而完成历史任务。即便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比如，中共经过整风运动后，在组织和思想上加强了一致性，但“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④。由此，把中共视为一个均质的实践主体，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中共思想活动的复杂性，从而遮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

（二）虽然中共的主体性呈现复杂图景，但也可以从运作逻辑上把握思想行为活动场景。从宏观趋向而言，思想行为活动场景是差异性的一致性的辩证运动，目标是催生严整的主体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⑤。就其运作逻辑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相互嵌套的往复运动：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理论认识、客观实际与政策实践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思想理论，可以视之为“第一运动”；在现实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31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5页。

与历史的关系上，历史事实、历史评价与未来愿景之间的互动能够输出历史叙事，可以视之为“第二运动”；在个体与组织、党内与党外之间，党内宣教、党的建设在规范党员个体自发意识的过程中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党外宣教、统战工作在整合社会意识与群体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凝聚力的整合效应，这种在党内塑造强主体性、在党外塑造泛主体性的持续运作，可以视之为“第三运动”。应当指出，以上运作逻辑是笔者结合学界已有经验进行的概括总结，并不排除有更加科学之认识的可能性，“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谁先认识了对象，谁就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①。

作为一个具有理想社会蓝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在未来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创造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②。由此，有研究者提出“政策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中介。一方面，政策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即理论的具体化或实证化；另一方面，政策也是实践转化为理论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经验通过政策得到初步概括，然后进一步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③这为我们把握差异性的一致性的辩证运动提供了一个线索。理论认识、客观实际与政策实践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以文件链为载体的思想过程，并逐步产出正确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形态，“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④。它既可能是中央领导人群体进行的宏观反思与总结，也可能是各组织层级人员围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具体实践进行的汇报、批示与经验推广。

就其实质而言，历史事实、历史评价与未来愿景之间的互动是“第一运动”在历史认识领域的延伸，具有塑造中共集体记忆的独特作用，堪称“第二运动”。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历史编纂的政治功能，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唯物史观指示着人类社会演进轨迹与共产主义社会，被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毕生理论探索的两大发现之一。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唯物史观相对于阶级斗争等理论更加易于接受传播。运用唯物史观整理中国历史的实践亦并不限于中共。对于中共来说，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毛泽东、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系统建构，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演变是研判中国社会性质和规划社会形态演变路线图的基础工作。这一工作延伸到中共党史的编撰领域，并在特定时期表现为文件形态的“历史决议”。事实上，包括中共党史叙事在内的历史叙事是文件论述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达成集体记忆与行动的逻辑起点。总的来看，这是一个把唯物史观原则、政治需要与未来愿景融入历史意识的进程，不断地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叙事。

除了“第一运动”和“第二运动”，差异性的一致性的辩证运动还表现为党内宣教与党的建设、党外宣教与统战工作。党内宣教与党的建设承载着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那就是用思想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以及纪律来规范党员个体的自发意识与行为，产生共同意志和集体行动，“干部是理论、路线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⑤。软性的宣传教育与硬性的组织纪律能够输出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引导自发意识转变为组织认同。党外宣教与统战工作承载着党内与党外之间的交互作用，那就是努力把中共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转变为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依托统一战线与对外宣传，中共广泛持续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嵌入社会网络、引领社会意识并进行社会整合。总的来看，以上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第三运动”。在

① 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3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6页。

③ 石仲泉《我观党史》第1卷，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

⑤ 石仲泉《我观党史》第1卷，第270页。

内部，它表现为自上而下地塑造强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的过程，实现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之间的组织认同；在外部，它表现为由内而外地塑造泛主体性和社会共识的过程，实现党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结。

（三）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既有培育集体意识与组织效率的努力，亦有消极涣散的风险。中共努力建设成为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持续推动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但也面临一些偏离或弱化主体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可能来自组织所在的生存环境，如时空区隔、地理气候等；也可能来自组织成员的主观方面，如个体素质、利己倾向、腐化堕落等；还有可能来自组织结构与制度方面，如组织规模、信息失真等。这反映了组织的自我否决倾向，可以称之为“离散现象”。在理论认识与客观实际、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等层面，“离散现象”有其特定表现和复杂称谓，遭到持续整顿，但也有一些是不可克服的客观因子。“离散现象”既可能是所在组织之主体性的消极因子，也可能是有益的，经过一定时期和条件转化为主体性的有机成分。总的来看，“离散现象”包含着一种同质与异质的共存互生趋向，表明了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辩证运动的界限，从更宽广的频谱反映了中共的主体性，有助于全面认识“谁在思想”这一问题。

在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当中，个体的组织化终究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党性基础上的个性是中共构建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个体可以提升集体意识和协作能力，但集体协作仍然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体现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性质”，“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①。另一方面，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也会发生一些偏离或削弱主体性的现象。究其原因，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并不能消化所有的差异性，特别是一些差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分布空间广、地理气候复杂、组织规模大、信息沟通失真、组织制度障碍等因素，在客观上影响组织的自我认同及其效率。除此之外，更为广泛和常见的“离散现象”，实则发生于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这可以是一种违背党纪党性的腐化堕落意识与行为，也可以是利己动机、贪功诿过等意识与行为，还表现为领会理论、掌握政策的能力不足，比如综合素质低下、政策能力弱、执行简单化等等。

“离散现象”具有非常复杂丰富的表现。这里，笔者主要分析由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所产生的“离散现象”。对于这类现象，“左倾”与“右倾”是基本的表述用语。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用来表述理论运用的误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与脱离理论的经验主义都属于主观主义，“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②。在组织运作上，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等表述；在政策执行上，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盲动主义等表述；在党的生活上，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表述；在具体工作上又有特定表述，比如统一战线工作领域的“关门主义”；等等。这些表述并不是杂乱无章、随意出现的，而是围绕一定的基准线并呈现对称性，比如围绕是否正确执行群众路线，出现所谓超越群众觉悟程度的“命令主义”和所谓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的“尾巴主义”这样一对术语。

在中共主体性的运动进程中，“离散现象”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历史地理解“谁在思想”这一问题的必要环节。相对于中共主体性所要求的同质性，“离散现象”是一种不利于培育同质性的异质性存在，因而需要持续地加以监察或整肃。不过，在差异性与一致性的辩证运动中，“离散现象”的判定标准有可能是正确合理的，有助于建设集体意识和实现集体行动；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从而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819页。

带来一系列错误评价和组织处置。由此，“离散现象”固然是遭到持续整顿的，但也存在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并有可能经过重新评价而成为同质性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离散现象”经过一定历史时期而上升为主体性的有益成分，也构成中共主体性的运动特点之一。比如，毛泽东等人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曾被视为“狭隘经验论”，遭到理论批判和组织处理，但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后，这些正确认识得到正确评价和丰富发展，上升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路线。类似案例，可谓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在历史发生学意义上，中共具有复杂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这是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对象，而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特质与一般，是开展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前提。笔者认为要回答“谁在思想”这一问题，首先要把握中共的主体性，分析其构成要素与运作逻辑。所谓主体性，是指依托组织运作与价值濡化而不断实现自我认同及其目标的能力，在构成要素上包括组织制度、理论武装和交通体系三个基本方面，在运作逻辑上体现为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产生思想理论的“第一运动”、产生历史叙事的“第二运动”和产生意识形态的“第三运动”。当然，在实现自我认同及其目标的进程中，中共还面临着一些偏离或弱化主体性的“离散现象”。它的发生根源和表现形式较为多样，是包含着异质和同质的混合物，集中体现了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复杂性。

二、中共思想史的镜像：在场、过度价值注入与失真现象

探究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本相，还有助于廓清中共思想史研究流失“真实感、历史味”的问题。一般而言，历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已经消逝、停留在过去的现象，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研究者的时代语境和研究对象的发生语境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边界。然而，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及其实践活动延续到当下，而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同样塑造着研究者和时代环境。由此，中共思想史研究在认识论上面临着一系列新特点，即研究主体不是在审视研究对象，而是身处其中，形成一种在场的熟悉感，甚至出现盲人摸象式认知；时代语境的价值偏好投射到历史事实，使过去与现在合为一体，以至于成为一种共时性存在。虽然历史研究难免渗透主观意识，然而一旦超出历史事实的允许范围，则变成了一种严重流失历史本相的“镜像”，成为“移今作古、亦真亦假”的虚造历史景观。如何突破“镜像”、合理渗透价值判断进而缓解失真现象，成为中共思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一）中共及其实践活动的延续，深度塑造了研究者的生活和研究场域，使中共思想史研究呈现独特的认识论特征。胡乔木曾言：“我们生活在历史里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在相当程度上生活在历史学里面。”^① 研究者所面临的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活历史”。中共党史作为正在延续的历史，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明晰的距离感，后续历程会影响对前面历史的评价和认识。并且，中共构建主体性的进程也是延续的，特别是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使得中共本身具有输出历史叙事的强大生产能力。这些因素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研究者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倾向，塑造了研究活动的场域。

历史学者时常强调以时代眼光看待已经远去的历史，“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②。这种诉求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历史研究对象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研究对象所处的过去和研究者所处的现在之间有着明晰的边界感与距离感，以至于历史研究面临着一种脱离当代生活、沉湎于过去的风险。比较之下，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这样的，其过去与当下都属于主体的自我记忆，因而过去和现在通过同一主体连接在一起，没有那种由于时间久远或主体消逝而造成的边界感、距离感。这还意味着历史事实本

^① 《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② （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身是逐步生长、尚未定型的，后续经历会改变前面历史的形态。譬如，若从1935年遵义会议往前看，革命战争是从胜利走向挫败的；而遵义会议后，中共革命转危为安、开创新局，这时所看到的历史是革命战争越挫越勇、走向胜利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不断生长，实际上增加了研究难度，使一些研究作品容易出现“过期”现象。总之，如何研究一个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和未来的中共党史，这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赋予历史事实以当代性（尤其是政治性）成为一种有组织发动和制度保障的行为，“以为研究过去对现实没有意义，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能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①。从过去到当下，中共构建主体性的活动是延续的，差异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运动也是完全延展的。这既影响着研究者，又输出着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理论认识、客观实际与政策实践之间的互动所输出的思想理论，从总体上形塑着历史认识的价值立场和问题导向；历史事实、历史评价与未来愿景之间的互动，把思想理论、价值立场和问题导向转化为历史叙事；党内宣教与党的建设、党外宣教与统战工作把这种历史叙事转化成为意识形态，推动中国历史叙事与中共党史叙事成为中国社会集体记忆的底色。由此可见，中共本身就具备生产历史知识的目标和能力，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形态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治史诉求比较完全地体现着这样一种理念：“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②这就强化了从当下需要来观察历史事实的视角设定，使过去与现在能够在价值立场上处于共时性状态。

进而言之，这些因素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倾向，汇聚成为影响历史研究实践的前置场域。从路向上来看，一些研究者具有唯物史观立场，本身从事着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的叙事工作，属于“第二运动”的参与者。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党内宣教与党的建设的路向接受这种影响，“共产党员党史工作者，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在研究党史和人民历史的时候，要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而不能‘置身事外’，像研究古代和外国历史故事那样去研究党史，更不能用搜奇猎异的低级趣味去研究党史”^③。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自身立场或者其他立场，从党外宣教与统战工作（国内统战、国际统战）接触这种影响，产生复杂的反应。可见，中共关于自身历史的问题导向、价值关怀和议题设置能够影响到研究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因素发挥着“锚定效应”，牵引或者强化研究者的议题设置、问题导向和价值倾向，成为影响历史研究实践发生发展的前置场域。

（二）既然中共构建主体性的活动能够影响研究者的议题设置、问题导向和价值倾向，那么中共党史、思想史研究就面临着强烈的价值关怀驱动。一方面，作为自身的记忆与叙事，中共党史工作者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进“第二运动”和“第三运动”，形成全党的历史意识，然而也面临着理论运用不当、观察视角狭窄等风险，容易出现教条化、简单化的价值注入。这种研究将文件语言简单化地贴在研究对象上，通过抽取历史事实和虚造历史场景来最大化地论证当代价值导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站在其他价值立场或运用其他理论资源观察研究中共历史的研究者，既具有看到中共全貌的“旁观者优势”，能够相对全面、冷静、理性地描述中共的思想行为，但也面临着价值立场、理论资源差异带来的曲解、误解风险，容易出现张冠李戴或者“为了否定而否定”的简单化做法。

深入“第二运动”和“第三运动”之中，中共党史叙事工作具有明确的运作机制和科学原则。

① 《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②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0页。

③ 《龚育之文存》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95页。

在认识和书写历史的运作机制上，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呼应“第一运动”，也就是运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历史书写。龚育之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恐怕只有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才能掌握。同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也只有读《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才能掌握。”^①理论创新成果本身就是中共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and 解读，而运用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历史自然也就带有思想史的特征。由此，以“历史决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论文献是研究和构建中共党史叙事的重要原则。当然，不能将此视为唯一准则和现成框架。比如，“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要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众多的历史事实，从各方面的历史活动，去进行研究，不能仅限于读《毛泽东选集》，否则，就会把历史搞得太狭窄、太单调了”^②。这种历史书写的科学原则也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实事求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统一”等。

对于研究者个体来说，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认识论需要深厚丰富的研究经验作为支撑。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这种支撑条件往往很难获得。一些研究作品片面强调原则性或机械执行政治性，“比如对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只强调写胜利、写成就、写正确一面，着墨用力于主观愿望怎么好，怎么纠正错误，而对党所经历的某些曲折和挫折不写、少写、轻描淡写，对错误的严重后果不做如实反映”^③。在研究视野上，不是从党的整体全貌和组织运作过程分析问题，而是沉浸其中、盲人摸象，发出一些省略大量历史信息和组织运作环节的片面之论，“好像号召一发出，方针政策一制定，领导工作就完成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通篇都是‘文山会海’”^④。对于现行政治决议文件，机械运用文件语言进行历史叙述，让历史人物“穿新衣、说新话”，而不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分析政治决议的历史依据。在论证理路上，“目的论”色彩浓厚，把纷繁复杂、上下求索的历程描述为单一方向的仿佛洞察未来结果的线性叙事。在研究导向上，不是按照历史发生顺序、从前往后看历史，而是从后往前看历史，以认同现行文件结论为目的。胡绳指出：“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⑤

基于不同价值立场或理论资源而研究中共党史和思想史，也呈现一些特点。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等国外学者在反思冷战思维的进程中，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以及思想史方面产出一批有质量的研究作品。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出发，对中共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比较容易看到中共的整体全貌，能够借助大量历史信息理解历史当事人的行为逻辑，擅长进行理论提炼和逻辑辨析，产生一些较为新鲜独到的历史见解。这些作品也大量译介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在反思“以论代史”“影射史学”等错误做法的基础上，国内中共党史研究者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等治学理念，“党性要求严格的科学性，也包含要把党史研究当作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从事这一层含义”^⑥。由此，通过借鉴他山之石、发掘利用史料、重新构建史实和理性平实理念，中共党史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不断出现。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存在或者能够实现纯洁无瑕的所谓“价值中立”和“客观立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⑦。

不过，基于相异立场或理论视角观察中共历史，也容易出现过度的价值注入现象。这首先是因

① 《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136—1137页。

② 《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136页。

③ 石仲泉《我观党史》第3卷，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④ 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⑤ 《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02页。

⑥ 《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295页。

⑦ (英) 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115页。

为，中共自身有其运作逻辑和价值话语体系，因而分析其价值选择必须熟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而运用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资源解释中共的价值选择和行为逻辑，容易出现一些隔靴搔痒式的比附、裁剪和想象，带来“以此经释彼经”的研究理路和叙述话语。再者，研究者的价值倾向、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也容易产生消极或否定的价值判断，“每个人的经历、遭遇不同，所处的环境、接触的人和材料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往往使人看问题时带有个人的感情，形成一些个人的偏见。存在个人好恶和偏见，就很难正确地进行党史研究”^①。此外，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把作为行为动机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从中共的行为逻辑中剔除出去，“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在党史宣传与研究实现合理的功能分化后，党史研究者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去直面历史的复杂性，深入到历史的细微处去探究真相，并用学术的方式去呈现自己的新发现。但其缺点在于，经史的分离一旦过度，就容易造成理论关怀的淡化、总体问题感的丧失和研究的碎片化”^②。

（三）无论是何种价值立场的历史研究，一旦超出历史事实的客观属性、无视历史本相的运作逻辑，就会发生过度且无效的价值注入。这种过度注入价值关怀的研究，既不能有效地回到历史场景，从事历史思辨和价值反思；也不能合理地呼应现实需要，从事历史鉴戒和经验总结。由于主观意识渗透和史料残缺不全等无法规避的因素，历史研究难免出现失真问题。然而，过度价值注入所导致的失真，缺失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规范，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中共历史的本相。这就把中共思想史本相折射成为一种严重流失历史信息的“镜像”，也就是把立体实景变成有立体感的平面虚影，使历史在得到部分呈现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失真。在这种状况下，中共思想史叙事所呈现的不是历史本相，而是一种“移今作古、亦真亦假”的镜像。

历史研究总是伴随着时代意识和价值关怀，但这必须以正确史实、严整逻辑和严密史料为前提。虽然纯净的“价值中立”和纯洁的“客观立场”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状态，但是相当程度的客观研究是研究结论之科学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价值注入的“度”就在于尊重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和规律，以正确史实、严整逻辑和严密史料作为立论基础，在呈现历史活动场景的过程中渗透时代意识和价值关怀。这也是前辈学者反复强调的“论从史出”原则。因此，过度的价值注入造成一种无效研究，具有以下特征：在观察视角上，裁剪史实以适应现实，用领袖人物替代党的组织，把不同层级的人物言论都视为党的言论，把文件的愿景描述想象成为已经实现的现实；在行为分析上，用今时之价值标准和逻辑来理解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把当下的价值诉求和政治生活覆盖在历史事实之上；在论证方式上，基于自身倾向或论证需要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片面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论述，表现出简单粗糙的“目的论”色彩。可以说，合理有效的价值判断是中共党史、思想研究的生命线。

除了时代意识和价值关怀的影响，历史研究难免产生失真现象，而过度价值注入所带来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失真问题。历史活动在发生时不一定留下全部痕迹和史料，史料形成后又面临着流失、删改等风险，而研究者自身由于主客观原因亦未必掌握关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全部史料。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失真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共党史、思想史研究当中。然而，过度价值注入所带来的失真现象，其主因在于主观层面的认识论误区，是可以通过严肃科学的研究规范进行减免的。在这种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关注的不再是通过研究历史本相而总结经验教训和反思价值选择，不是从学术史视野考量研究实践，而是基于肯定性价值立场或者否定性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先行、论证目的先在，直接把当代的文件语言套在历史事实和人物上，或者粗糙地运用某种理论的概念话语进行历史分析，其实质是通过抽样作证来简单化地论证现实政策行为的合理

^① 郭德宏 《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应星 《“以史解经”与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性，已经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这种认识论误区发展到极端状态，就是根据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史实的“影射史学”，“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①。

过度价值注入使中共思想史本相被经常地呈现为一种“镜像”。无论是肯定性价值立场还是否定性价值立场，都是把现在的价值判断覆盖在历史事实之上，通过抽取部分历史事实来搭建一个适合论证需要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现场。这是一种外在于研究对象的比附、裁剪和想象，忽略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与自为状态，忽略历史当事人自身的行为逻辑与价值倾向，把动态立体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转变为静态平面的线性因果论述。这种“移今作古、亦真亦假”的镜像，既无法看到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历史本相，也无法进行严肃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总结，“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②。

总的来看，中共党史、思想史研究在认识论层面有其特殊性，并因此面临着比一般历史研究更为复杂的研究难度。在构建主体性的实践中，中共具有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生产能力，造成了影响研究者之问题导向、知识基础、议题设置与价值倾向的前置场域。这种“在场感”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了浓烈紧密的价值关联，引发了正向或负向的价值反馈，而这些强烈的价值关怀流淌在中共党史、思想史研究实践之中。一旦价值关怀超出历史研究的允许范围，那么研究本身则发生“真实感、历史味”的流失问题。由此，过度价值注入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过去与现实之间缺乏明晰的边界和适当的距离，把久远的过去折射成为当下生活实践的“镜像”，使历史在得到部分呈现的同时出现了整体性失真。这种认识论误区的实质是造成了价值判断与史学规范之间的失衡，阻碍了历史本相的呈现，更无益于历史鉴戒和人文关怀。

三、中共思想史的实证研究：内涵、形态与操作规程

中共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为进一步解决价值判断与史学规范之间的失衡问题提供了条件。价值判断旺盛与史学规范弱化问题的实质是主观随意性，具体表现在忽略史料批判、虚造史实场景、照搬文件语言等方面。降低主观随意性是中共思想史研究科学化的必经环节，要求在史料批判、史实解读等方面建立契合研究对象内在规定性的实证研究规范。中共思想史的实证研究不是实证主义理论的照搬，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立场和研究对象特质，倡导一种以严密史料、严整史实、严谨逻辑、严正价值为核心要素的思想史研究理念。这一理念在研究形态上不再刻意地划分人物研究、事件研究与文献研究，而是让人物、事件、文献等要素回归中共思想行为活动场景，探寻其中的问题关切与互动图景，从全景视野呈现中共应对外在环境与内部问题的思想过程。在研究实践方面，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需要在学术史、议题设置、史料批判、理论方法、叙述语言等环节形成明确的操作规程。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正在从追求增量进入提质增效的阶段，越来越要求生产具有严密论据、严整逻辑、宏阔视野与公共关怀的中共党史知识。从学术史视野看，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试图把注重史料、史实但忽略理论思维的倾向同注重思想、文本但史学规范匮乏的倾向结合起来，实现价值判断与史学规范之间的相对平衡。因此，构建实证研究规范并非搬运实证主义理论，而是对中共党史、思想史研究进展与不足的因应，其内涵是依托历史学规范与唯物史观原则来实现价值判断、史实重建与历史解析的有机结合，通过把握中共思想行为场景来呈现中共应对内外问题的关

^① 《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47页。

^② 《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4—305页。

切与思索。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严密史料、严整史实、严谨逻辑、严正价值，旨在使思想史作品“有足够的事实的根据，经过周密的论证，提出一种有系统的创新的见解、意见”^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料挖掘、史实重建等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推进思想史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蓬勃发展，不断充实扩展自身体量，研究时段不断下移、研究分工不断细化、研究议题不断丰富、研究作品不断累加。其间，依托新史料、新领域、新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式，呈现追求增量的特征；而随着研究空间渐趋饱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增量式发展方式已现疲态，发现新史料和填补空白点的难度越来越大。并且，由于时代语境的更换，中共党史研究面临的社会需要也从注重史实转进为注重史实基础上的史识，尤其是面临着国内外关于中共与中国巨变的求解需要。这种知识供给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将推动中共党史研究进入提质增效阶段，要求在注重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历史解析与理论提炼，要求在运用已有研究成果与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提升整体视野和综合研究，提供一种具有严密论据、严整逻辑、宏阔视野与公共关怀的中共党史知识，从而深度理解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

这要求我们从更广阔视野审视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内涵。思想史研究具有涉足学科多、领域广的特点，因而容易被认为是模糊不清、无法归类的研究方式。相比之下，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出现是中共党史研究从政治史领域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结果，主要研究指导思想发展史、党的领导人思想史、党内知识分子思想史、党员群体心理意识等。这种界定主要还是延续政治史研究的理念与做法，注重政治定性和思想结晶，对历史本相和思想互动关注不够。长期来看，狭窄的内涵设定不利于思想史研究的全方位伸展和学术规范建设，容易出现“学术史评析不足、史料基础不牢、研究范围狭窄、文本解读能力不高、经典文献和核心概念研究不够、现行政治理论和历史研究形态混居、理论与方法探讨不足、思想功底贫弱、理论自觉弱化、发展思路模糊、学术创新缓慢等一系列问题”^②。笔者认为，由于中共党史研究在史料、史实方面的长足进展，中共思想史研究具备了研究中共思想行为全景的实践条件，而其内涵界定应当充分反映这些属性，探究中共应对内部或外部某一问题的关切与机制。

进而言之，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内涵设定必须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全景与特质，避免主观随意地切割研究对象。中共思想行为活动具有复杂多歧的运作过程和相对清晰的理论结晶，都应当纳入研究范围。倘若单独抽取理论结晶及其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就容易简化思想行为场景，仿佛正确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活动一开始就有了理论结晶的指导。这就容易出现注重思想、解释但缺乏史学规范的倾向。与之同时，为了避免这种“倒果为因”“以论代史”甚至“影射史学”现象，一些研究者选择忽视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历史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把概念、话语、仪式等事物一概归结为权力关系，把行为动机一概归结为利益争夺，出现所谓“理性人”假设、“权力斗争史观”等简单片面的历史解释。当然，必须依据历史情境具体地衡量何种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政策制定和行为发生，尊重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与全部特点，在把握思想行为全景中审视具体问题，不宜粗暴地割裂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天然联系。可见，注重史料、史实但忽略理论思维的倾向和注重思想、解释但缺乏史学规范的倾向都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亟待平衡融合。

正是在这种学术史视野中，构建实证研究规范成为提升中共思想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首要环节。就发展进程而言，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依托历史学规范增强论据多元性和史实准确性，根据中共思想行为场景之历史本相来相应地调整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这要求把唯物史观、历史学规范同研究对象特质结合起来，提炼研究经验和规范研究过程，形成一种契合研究对象特点、反映研究实践规律的理念与规范。笔者认为，中共思想史的实证研究或可成为一种探索方向，它旨

① 《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126页。

② 王婧倩 《“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在通过历史事实客观性和研究过程规范性来实现价值判断合理地渗透到历史认识之中，从而生产出具有严密史料、严整史实、严谨逻辑、严正价值的思想史论著。这里的“实证”并非反对价值判断或研究者的能动作用，更不是机械搬运实证主义理论，而是试图在中共党史、思想史领域实现价值判断与史学规范之间的相对平衡，在研究对象上反映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全部场景、运作过程及其问题关切，在研究方法上适合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实践特点与特殊要求，从而为研究者发挥历史认识能动作用确立史料、史实、史观的坚实基础。

(二) 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还是一种新的问题导向，力图依托中共主体性的构造与运作来培育整体史研究方式。在研究起步阶段，中共思想史研究主要依托人物研究、事件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式展开，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但在客观上也分割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时至今日，中共思想史研究具备了良好基础，有条件开展更高层级的综合研究。这要求依托中共主体性的静态构造及其动态运作来理解要素与结构、环节与过程之间的天然联系，探究中共思想行为的动态场景，把“文本理路”“语境理路”同“结构理路”结合起来，培育中共思想史的整体史视野，以此深化人物研究、事件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实现具体问题研究与整体结构研究的内在关联。

中共思想史研究依托人物研究、事件研究等方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分散用力、整体视野弱化等问题。随着中共思想史研究的起步发展，聚焦生平事迹与思想的人物研究、关注思想论争过程的事件研究、探讨文本内容及其演变的文献研究、围绕人物或文本开展的比较研究成为主要研究方式，形塑了学术组织、史料出版和学术活动。此外，中共思想史研究也可划分为通史研究和专题研究。通史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开展，研究和叙述指导思想发展史。专门史的划分标准比较多样，常见的是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门类。依托这些研究方式，中共思想史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各个领域的资料整理和具体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应看到这些研究方式在客观上起到了分割研究对象整体性的作用，把人物、事件、文献等要素从中共思想行为场景中抽取出来，凸显了具体要素、弱化了整体面貌，容易忽略组织整体环境对理解这些要素的重要作用，难以形成关于中共思想史整体面貌的认识。

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不仅把中共思想行为全部场景纳入研究范围，而且力图依托中共主体性的构造与运作来培育整体史研究方式。所谓整体史研究方式并不是追求面面俱到、无一遗漏的研究实践，更不是凭空罗列组装一个整体叙事，而是一种把握中共思想行为活动的要素与结构、环节与过程的辩证思维，“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从静态结构来看，组织制度、理论武装、党内交通塑造了思想行为活动的路径与逻辑，为黏合要素与结构、环节与过程发挥着基础作用。从动态运作来看，“第一运动”“第二运动”“第三运动”是中共实现自我认同并应对外在环境的基本方式，承载着人物、理论、文献等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路径、过程和结果。由此，中共主体性的构造与运作从结构上反映着思想行为活动全景，而整体史研究方式就是致力于培育这种结构化视野，致力于把思想行为活动的关切提炼为能够呈现“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研究议题。

由此来看，这种整体史研究方式还有助于深化人物研究、事件研究和文献研究。中共主体性的构造与运作对人物、事件、文献都具有塑造作用，而离开这一整体环境就容易片面地看待人物、文献等要素。譬如，人物研究往往把人物从历史中抽取出来加以凸显，容易出现夸大人物地位作用、无视组织场景乃至过分认同人物言行的现象。因此，对人物、文献等要素的理解应当包含着对组织结构和运动全程的理解，既要把人物这一要素抽取出来加以凸显，但又要把该人物的社会交往、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织联系等相关要素一并抽取，以此才能历史地全面地理解人物的思想言行^①。运用中共的主体性构造与运作来认识人物、事件、文献等要素，能够使人物研究、事件研究和文献研究具备整体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层面探究思想脉络、演变趋势还是从微观层面聚焦人物、文献或理论，都应当反映局部与整体、要素与结构的内在一致性，避免片面化、简单化的观察。可以说，整体史研究方式表达了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问题导向，那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确证思想行为场景的整体性，立足整体全景来考察具体要素。

在研究理路方面，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旨在运用“结构理路”进一步发挥“文本理路”和“语境理路”的分析能力，形成具有整体视野的分析理路。“文本理路”和“语境理路”是思想史研究的一般常见方法，在中共思想史研究实践中也获得了运用。“文本理路”旨在从文本的生成、构造、内涵与版本演变等方面解读思想发展，倾向于运用一系列典型文本构建思想史脉络与叙事。“语境理路”旨在从具体的历史的语境来解读思想言行，“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文生义”^②。具体到中共的思想行为场景，运用“文本理路”和“语境理路”必须首先理解文本和语境的生成机制，避免无差别地对待各种文件文本或者主观想象历史语境。中共主体性的构造与运作展示了研究对象的结构，说明了人物、文献、事件所附着的组织结构与运作过程。通过逆向运用这一特点，可以形成一种全面理解文本、语境等要素的“结构理路”——依托组织结构与制度逻辑来理解文件的生成流转、人物的言行情感、事件的发生发展、组织的运作流程。因此，为了捕捉中共思想行为的全部场景，“结构理路”“文本理路”“语境理路”可以发挥其各自效用，形成互补关系。

（三）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旨趣是告别经验形态的主观随意性研究，在实践中总结提炼历史经验，摸索建立一整套契合研究对象内在特质的研究规则和操作规范。从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来看，实证研究是一个必经阶段，担负着整合深化已有研究、探索确立研究规范的历史任务。笔者认为，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应当秉持以严密史料、严整史实、严谨逻辑、严正价值为核心要素的思想史研究理念，并具体落实为系统化的操作规程。这种操作规程包括但不限于反映知识生产科学化程度的学术史叙事、体现合理价值判断的议题设置逻辑、立足信息交互实态的史料批判、迎受外在理论方法的内生视角以及注重逻辑理性与平实语言的历史书写等等。虽然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并非思想史研究的最高形态，但它是通向高级形态的思想史研究的必要准备和基本要素。

学术史叙事是思想史研究的起点，更是衡量研究水准的基本指标。所谓“学术史叙事”，是指研究者在求真求解目标的观照下，审视既往研究状况进而阐述后续研究合理性的实践活动，代表着现代知识生产的协作性、公共性和标准化程度。具体到中共思想史研究，从自说自话、师心自用的手工作坊式研究转变为具有客观标准、对话空间和集体协作能力的公共知识生产，尤其需要培育学术史叙事能力。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学术史叙事，可以从史料利用效率、史实构建进展和价值关怀导向三个基本要素展开，据此作为评价既往研究和开展跟进研究的基本依据。史料利用效率是指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的程度，体现为史料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对整个研究具有基础作用。史实构建进展是指历史事实的准确程度，体现为对中共思想行为场景的全面把握。价值关怀导向是指叙述史实与解释历史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偏好，反映着价值判断与史学规范之间的平衡程度。学术史叙事旨在从起始环节降低研究实践的主观随意性，在动态中逐步培育中共思想史的知识生产秩序。

在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中，设置研究议题的一个原则是确保价值判断和史学规范之间的相对平衡。设置研究议题不是出于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而是在体察研究对象的真实状态与既有研究之学术

① 例如，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杨琥著《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等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谱主的人际交往、组织生活和思想言行，实现了“聚焦”与“散光”的统一。

②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页。

进展的基础上进行研判,贯彻实事求是的求真求解理念。这要求从整体结构和全景视野来定位具体选题,抽取具体选题但不夸大或缩小该选题在历史脉络中的实际位置,聚焦具体选题但不离开该选题所在的整体结构与发生场景。对于长时段、结构性或者抽象性的宏观议题,亦应注意从长时段视域观察内在连续性、从整体研究视域关注组织层级之间的互动、从抽象研究视域获取具体要素的支撑,避免虚构的连续性、死板的结构性或空洞的抽象演绎。在这种依托史实的选题基础上,还可以提炼较为高阶抽象的选题。譬如,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各自的理论修养,在不同时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事实。这既可以开展依托具体史实的思想史考察,也可以从中提炼更具有广阔观察视野的议题,例如怎样处理理论框架之普适性与历史事实之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此观察这些历史人物在理论运用方面的思索与困惑。

此外,设置研究议题还必须正确对待政治社会议题及其价值判断,避免陷入“锚定效应”。具体到中共思想史研究,“锚定效应”的表现就是研究者在熟识当前政治社会生活的状态下机械地将政治社会议题直接作为历史研究议题,以至于忽略历史常识和史学规范。比如,我们可以研究毛泽东关于生产力、新文化或人民利益的论述,但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毛泽东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机械照搬文件语言甚至把当代时髦词汇套用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做法,容易产生一种违反公共历史常识的低级错误,既不利于政治社会议题的研究和宣传,也无益于汲取历史智慧解决当代发展问题。也应看到,没有脱离政治社会环境的纯粹学术研究,“具有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并不必然影响或削弱具体党史研究的学术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是否具有更大范围内的人文关怀,是否能反映人类的普遍性价值以及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①。因此,研究者既不能机械地照搬政治社会议题,也不必想尽办法脱离政治社会环境,而应当思考如何促进政治社会议题合理地转化为思想史研究议题。

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应当加强政治宣传、社会环境与时代意识的学术溢出作用。除了通过发挥资政育人功能来获取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动力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借助政治社会议题修炼历史洞察力。政治社会议题本身包含着对历史发展的宏观审视和现实反思,反映着历史发展与当代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助益历史研究的因子。对此,研究者可以“逆向思考、顺向叙事”,体察政治社会议题的问题导向和历史意识,使之转化为思想史研究议题。“逆向思考”就是站在当代的认识高度俯察历史演进和历史人物,形成一种了解历史全貌的阔视远想的穿透感;而在议题表述和历史研究中,则需要“顺向叙事”,也就是按照历史发生顺序探讨历史脉络的复杂面相和历史人物的上下求索,在尊重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认识能动作用,避免单线条叙事。这种良性转化本身也是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能够为中共思想史研究赋予独到的问题意识。可见,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并不是拒斥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必须运用历史研究及其史学规范来合理地渗透包括价值判断、人文关怀在内的主观意识。

在确立研究议题时,前人研究、问题意识和史料利用等要素是互为支撑的,而史料利用是发挥基石作用且贯穿研究全程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探讨中共思想行为与史料形成现象的广义史科学。对于研究者而言,没有天然的现成“史料”,只有参与历史发生进程而遗留下来的痕迹。因此,在性质和范围上,史料利用就是采取相应方法分门别类地利用一切遗留痕迹,而不是拘泥于关于“史料”的定义和观念,更不能以史料形式(比如馆藏档案、出版文献)作为史料价值的判别标准。“史料”的价值既与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多寡有关,也与利用者的分析功力和知人论世能力有关。在此基础上,必须探究史料形成过程,把握各类痕迹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共构建和运作主体性是依托信息交互体系而实现的,而信息交互过程遗留了丰富多样的痕迹。若反向运用这一路径,可以依托信息交互实态、组织层级关系、人际交往、时空要素以及通信

^① 吴志军 《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党史研究“学术史”概念(上篇)》,《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5期。

技术条件等因素，全面把握各类痕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整体面貌，从而能够解析中共思想行为场景。

由此可见，必须结合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特质来具体地应用史料学一般原则，并形成卓有成效的史料利用理念与方法。譬如，“史料长编”要同时参照时间顺序、事情发生顺序和组织运作逻辑，注意组织意图与史料解析的互补作用。作为参与历史发生进程的遗留痕迹，史料本身是历史当事人表达意图和实施行为的表现，而解读这种意图及其价值判断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组织逻辑和意识形态话语。这也能说明，为何研究者不能简单地把史料文本当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譬如概念、范畴、原理、理论等）排除出去，也不能忽略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的作用。再如，要采取与研究主题处于同一时空维度的文本。笔者曾以“文件”这一史料原型为例，指出研究者必须从史料形成过程来深度理解史料，从原初文件到史料文本的过程实际上包含着原生组织环境、档案管理环节以及出版利用等多层时空维度。因此，解读史料应根据研究主题选取相应时空维度的文本，把处于不同存储形态的文本如选集、文集、年谱、书信、阅读笔记、小册子、报纸、刊物等汇编起来，使之具有时间顺序和组织运作逻辑。^①可以说，促进研究经验的提炼和理论化表述是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恰当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有助于史料批判、行为解析乃至叙事构造。中共党史研究固然要积极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吸收其合理内核，但也要避免机械运用、僵硬植入。譬如，新文化史理论方法关于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度认识历史。但是，如果把一切意识形态、话语、宣传等要素都简单化地归结为权力关系，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化，忽视了这些要素的公共作用和实际效果，也会带来历史认识的同质化趋向，形成千篇一律的历史叙事。当然，研究者也不必形成理论方法“恐惧症”。理论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整合碎片信息、分析行为动机和呈现历史场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合理内核，首要在于了解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来降低这些理论方法的外源性，在研究实践中检验这些理论方法的适用性，进而实现本土化。应当指出，理论方法的效能不在于是否“新”或“洋”，更不是提供一种用于填充史料的现成的叙述框架，而在于能够适用和解析研究对象，提升研究实践的效率。

进而言之，有效运用逻辑思维是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操作规程的重要一环。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时常被理解为不沾染任何理论色彩的朴实研究风格，被视为直观的、停留于事实表面的历史认识活动。但这并不是实证研究的特点，“根据实证主义的精神，确定事实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阶段，它的第二阶段便是发现规律”^②。倘若狭隘地理解实证研究，思维活动将会出现片面重视直观、显性、归纳和微观的特点，容易陷入历史偶然性的现象迷雾，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的历史见解。所谓“有效运用逻辑思维”是指根据研究进程的变化而具体地运用直观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微观与宏观等辩证思维方式。在史料搜集与提取历史信息的过程中，当然要注重直观、归纳和微观的思维方式，充分获取历史现象的各个属性，确保史料解析的有效性和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抽象、演绎和宏观的思维有助于深入理解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解析文本内容的理论逻辑，了解研究对象在全局当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提升历史认识的视界，推动形成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这是依托于历史研究而达成历史认识的全部路程，也是不断推进历史认识的方式，“认知不可能单凭抽象/理论或单凭经验/实践任何单一方面，而必须兼顾、连接两者，从经验中得出概念和理论，在理论中看到经验和实践”^③。

① 参见吴起民《从文件到文本：试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多维史料观》，《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②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0页。

③ （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页。

叙事是历史认识成果的基本呈现方式。一般而言，思想史叙事包含着两种设定逻辑主线的方式：一种是关注“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演绎展开，以此串联人物、事件和文本，寓事于理中；一种是关注历史环境、人物与思想文本的互动进程，依托历史事实、实践场景而展开，寓理于事中。当然，选择何种叙事逻辑主线，需要根据研究议题、叙事需要、呈现效果等因素来决定。具体到中共思想史研究领域，依托历史事实、实践场景而开展思想史叙事是当前阶段解决“真实感、历史味”流失问题的需要，而确立“历史性阐释”原则是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内在要求。“历史性阐释”原则要求按照历史发生顺序呈现历史环境、人物意图与文本表达之间的互动进程，以此作为叙述主线，并把思想的内涵与逻辑作为一个“点”加以呈现。作为思想载体的文本首先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研究者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对待文本，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人物意图来任意解读文本。尽管人们确实可以脱离历史语境谈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文本，就其思想理论内涵进行全新的演绎和阐释，但这显然不属于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围。确立“历史性阐释”原则的思想史叙事，依托严密论据而形成严整史实，从而能够承载研究者的严谨逻辑和严正价值。

在叙事语言上，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倡导“切实、平和、普适”的语言风格。虽然思想史叙事常常体现出研究者的个人风格，但其底色仍然是一种公共历史知识，“历史学不同于文学，不能虚构和夸张。但是在准确（事实）、鲜明（观点）的基础上，文字力求生动些，让人能读得下去，还是应该的”^①。对照之下，一些思想史论述生硬地把政治文件语言、互联网自媒体语言、域外词汇作为叙事语言，造成笼统化、情绪化和私人化的表达特点，强化了思想史研究的主观随意性问题，不利于形成稳定、客观、可靠的思想史知识。因此，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需要把语言表达准确作为叙事语言的基础指标，推动形成一种“切实、平和、普适”的用语原则。一是要求切合实际、恰如其分，减少使用那些具有夸大作用的“定性”语言。比如，研究者可以把一些行为现象描述为注重道德内省或突出群众作用，而一旦采取“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等词汇，容易出现拔高、夸大和绝对化的表述结果。当然，倘若一些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话语具有适用性，也可以运用。二是要求平稳理性、客观守正，减少使用那些具有鼓动作用的“煽情”语言。思想史叙事并非虚构性叙事，讲求客观性，而用典、比喻等文学叙事手法容易带来理解和表述的偏差。语言可以生动形象，但必须以准确表述事实和观点为前提。三是要求普遍适用、易于流通，增强词汇的规范性和公共性。研究者可以基于研究发现和表述需要创造新概念新话语，但必须基于学术史视野和公共语言规范，不宜造成仅属于一个人或小团体的晦涩用语。

四、结 语

从长程历史视野来看，中共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在纵向的阶段衔接和横向的结构层级上形成了宏大精微的思想行为全景。相对而言，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在呈现思想行为场景、理解运作逻辑和释读实践机制上尚缺乏体系化的研究规范，甚至尚未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全貌、结构与特质。虽然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已经取得充分进展，但从总体上来看，既有研究实践与精密复杂的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状态，制约着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思想史研究上，“思想史研究的不发达在较大程度上导致整个党史研究出现诸如思想解释和理论总结不足以及‘问题意识’淡薄等根本性弊端，目前已成为党史研究实现深度学术化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之一”^②。由此，探索建立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规范既是思想史研究自身学术化进程的一个环节，用以确立历史性原则；又是整个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一个阶段，用以提升思辨解析能力。这要求我们从中共党史的巨大体量和具体特点出发，以更加广阔开放

^① 《彭明文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② 王婧倩《“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的视野建设中共思想史的研究规范。

思想史研究是历史认识活动的高阶环节，代表着历史认识的思辨能力。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把历史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然后进行分工协作研究，而“思想史”也就变成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并列的研究领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思想的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思想”。这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分工协作对“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从历史认识活动的深化过程来看，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发生机制研究和历史思辨研究实则是一个连续动作，而思想史研究是以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发生机制研究为基础，洞悉历史演变的全景和机理，完成对历史上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判断的反思。由此来看，把研究“历史上的思想”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全部内涵，仍然容易变成一种“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①。笔者认为，思想史研究是历史认识活动的高阶状态，是通过深刻认识包括思想要素在内的诸种历史要素相互作用的全部过程来提出和凝练具有穿透力的“思想”。相应地，文本考据、事实考究以及研究“历史上的思想”等活动都属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环节，而思想史研究者理应掌握历史认识各个环节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并能够将历史认识活动推向深入，形成思辨结晶。

在思想史研究的认识机制中，思辨首先是历史地分析主体与环境的互动进程。思想史研究必须依托全面准确的历史事实研究来承载历史见解，“我们写历史要求再现历史真相、分析历史特点、阐明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对资料钻研愈细致，搜集愈全面，则历史真相的复写才可能愈清晰，才可能将其时代精神、思潮趋向、人物动态以至于当时的景象、气氛勾画出来。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分析其特点，阐明其规律，自然而然地得出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②。为此，思想史研究必须充分吸收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历史认识成果，在文本考据、事实考究等方面获得翔实全面的历史信息，以此搭建历史场景。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必须努力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分析那些影响行为的价值选择、信息多寡、情感心理和问题导向，“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意识反应’（conscious response）”^③。具体到中共思想史，研究者应摆脱“一概而论”的认知方式，具体地把握中共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状况，以此作为理解人物、组织、文件、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参照物。

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思辨还需要谨慎地对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从整个研究过程来看，思想史研究者的理想轨迹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是严守历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历史的能动工作”^④。相对于历史当事人，思想史研究者的优势在于洞悉历史结果、掌握各方信息、具有全局视角，在面对海量史料和复杂史实时可以充分运用这种优势，从容地搭建历史场景；而在进行历史分析、人物评价和价值反思时，则必须警惕这种优势，充分理解历史当事人在预知结果、信息掌握和全局视野上的局限性，充分理解自身在生活境遇、实践经验、情感体验等方面同历史当事人的差距，预防出现苛责前人的情况。对于中共党史领域的研究议题，研究者需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形成明确的边界感，合理地运用时代意识，“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⑤。其中，尤要正确对待“历史决议”，“遵循历史决议，当然要求人们遵循决议关于重大历史和理论是非的基本结论”，“科学的党史著作，不是以历史决议为出发点做简单的演绎，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中引出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来。所以，这是一项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进行周

①（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359页。

②《彭明文存》，第54页。

③（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④（日）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

⑤《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119页。

密的分析”^①。

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的宗旨是提供一种具有严密论据、严整逻辑、宏阔视野与公共关怀的中共党史知识。尽管历史研究在很多时刻被视为“个体爱好”或“私家花园”，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参与，因而最终也要接受公众审视。由此，作品将成为展示作者的透明橱窗，展示作者对历史环境的认知程度，也展示作者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文关怀程度，“人能超越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的能力似乎是由他认识自己陷入这种环境程度的敏感性而决定的”^②。应当指出，中共思想史实证研究不是拒斥研究者自身的价值情感关怀，而是避免个人好恶偏见绑架甚至替代历史分析，强调研究者可以从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视野进行价值分析评判，并将之载入扎实的历史作品之中，“判定一本关于思想理论史的学术著作的理性价值，很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包含着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揭示”^③。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作品的生命力固然体现为史料、史实、史识等因素，但最终要看价值层面的思辨能力和人文关怀。

(本文作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292—1293页。

② (英) 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133页。

③ 侯且岸《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答客问》，《北京党史》2017年第1期。

《党的文献》2023年第1期要目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曲青山)	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关于党规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张海涛)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陈云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论断 (梁 营)
《复兴文库》的历史启示 (吴德刚)	1945年全党对党的七大精神的学习贯彻 (薛 琳)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丰富意蕴 (孙晓莉 江蓓蕾)	党的七大对处理好党的干部关系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洪 汛)
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 (许先春)	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 (冯东兴)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王 强)	中国共产党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以三个历史决议为重点的分析 (韩学亮 黄广友)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于 萍)	日本机构涉中共调查报告的历史考察 (1921—1945) (李笑笑 郭循春)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学习习近平关于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论述 (张 林 田克勤)	2022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研究系列学术会议综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刘会强 连 通)	